

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变迁

马 静 黄曼丽

[摘 要]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沧桑巨变,经历了从“书荒”到“书海”的辉煌发展时期。根据各个时期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,我国的图书出版呈现不同的传播现象和特征变迁。从总体上说,当前我国出版业总量规模极大,但其质量、效益、竞争力、影响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

[关键词] 改革开放以来;图书出版业;传播

[中图分类号] G23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2-7320(2008)06-0786-05

1978 年的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,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,也给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带来了一次新的转型和调整。我国亿万读者迫切需要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时期的“阅读饥渴”中走出来,从而开始跨入了一种充满激情阅读的时代,我国图书界的发展进入复苏和发展时期。尤其是 1983 年中央作出的《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》,对促进当时和此后 20 多年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一、20 世纪 80 年代: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复苏与发展

(一)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,出版业中出现市场竞争

改革开放以来,在经济发展的刺激和要求下,有关部门开始对出版业实行自主开发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政策,国家对出版业则在政策上给予指导。如 1979 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了“立足本省,面向全国”的新方针,这一举措解放了占全国出版社近半数的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。1988 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《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》及《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,指出:“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,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”,“出版社既是图书出版者,又是图书经营者”。从此,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迅速增加,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版复苏与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978 年全国仅有出版社 105 家,而 1988 年已发展到 502 家(其中,中央级 197 家,地方级 305 家)。各出版社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意识,开始有了商业和自主意识,出版业市场出现了竞争。1987 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、每年换一个举办地的全国书市(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)、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(BIBF)并称中国出版业年度三大盛会,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图书出版界发展和繁荣的市场特征,极大地丰富了读者和图书销售商选书购书的范围,也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的日渐活跃。

(二)长篇小说出版系列化,丛书、套书出版多样化

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 250 种,这无论在内容还是数量上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。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出版注重系列化的特点,推出了一批丛书、套书。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》,作家出版社的《当代小说文库》,江苏文艺出版社的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丛书》,中国工人出版社的《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的《美学译文丛书》、《心理学丛书》、《将帅诗词选》,江西人民出

版社出版的《地球上的红飘带》等,在社会上反响很大。另外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新学科丛书》和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《人与文化》丛书,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比较文化丛书》,东方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思想文化丛书》等,受到了广大青年学子和学术工作者的欢迎。此外,还有新疆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五套描绘西域风情的丛书《中国大西北丛书》、《丝绸之路丛书》、《西北历史丛书》、《西北史地资料丛书》、《西北史地资料译丛》也在1988年陆续出版。

(三)哲学、社科、科技和经济类新书大量涌现

20世纪80年代,哲学、社科类图书出版了4.6万多种,其中出版新书3.8万多种。如任继愈的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、庞朴的《儒家辩证法研究》、蔡仪的《美学原理》、朱光潜的《西方美学史》、侯外庐的《宋明理学史》等,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。经济学方面,薛暮桥的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、孙冶方的《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问题研究》、许涤新的《论社会主义的生产、流通和分配》等,印数达100万册以上,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。科技类图书方面,共出版了8.6645万种,总印数达20.4亿册,不仅品种繁多,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十分广泛。

(四)港台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学广为流传

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,港台通俗文学创作市场的运作机制已经相当成熟,它促成了这类图书在内地的流行,同时也使港台地区与大陆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加强。当时中国的文学图书出版市场出现了两个热潮,一个是以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温瑞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席卷了内地的青少年读者市场;另一个是以琼瑶、亦舒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红遍大江南北。从1984—1985年,全国有60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武侠小说,数量达到了三四千万套,让众多出版社尝到了紧跟大众阅读市场潮流带来的甜头。

(五)西方大量的哲学理论图书陆续被翻译出版

这一时期主要出版的西方哲学丛书有: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推出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,《西方哲学史》丛书;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“海外汉学丛书”;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;包遵信主编的“走向未来丛书”;甘阳等主编的“文化:中国与世界”丛书(三联版);李盛平等主编、华夏出版社出版的“二十世纪文库”等经典著作。西方哲学图书的出版高潮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的批判思潮,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二、20世纪90年代: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

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出版业呈现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阶段,并开始走上立法化、国际化、多媒体化、多元化以及集团化的发展进程。

(一)出版业立法开始,图书版权贸易增多

党的十四大以后,国务院先后颁布了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、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、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,明确了出版者、印刷者和发行者的权利和义务。1990年我国正式颁布著作权法,并于次年开始实施。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,正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图书业出版角逐中。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开始受到法律约束,对以引进出版海外作品为主的出版社影响巨大。自1995年至1999年4月,我国与国外的图书版权贸易超过1.5万项,购买对象国也从美、英、日等少数国家拓展到更多国家。

(二)大陆通俗读物、人物传记全面流行

20世纪90年代初,王朔小说成为阅读和出版的热点,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竞相谈论王朔的文化景观。此外,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先锋文学,比如苏童、余华等人的作品,到90年代成为了一种时尚符号。随后出现了张爱玲热、林语堂热、梁实秋热、王小波热,还有周作人的散文等,构成了消费文化的“精品”。此外,90年代的市民化书写、市民审美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业走向。譬如,以池莉为代表的“新写实”作品大受欢迎。同时,名人传记大量出现,迎合了90年代大众偶像崇拜心理,如赵忠祥、倪萍、杨澜等人的个人传记,引起了追星族的广泛关注,印数达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。

(三)套书、丛书的散文出版出现热潮

20 世纪 90 年代初,在文学出版领域首先刮起的是散文出版的旋风,其开创者是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。1989 年 9 月,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书市上,百花文艺出版社改换包装重新推出的散文系列《现代精华》首辑 10 种便一炮打响,成为当时出版界的一大亮点,其中一些如朱自清的散文,短期内销量就达到十几万册,给了出版社很大的信心,随即带动了持续整个 90 年代的散文出版热潮,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地方文艺出版社是其中的主要力量。这些散文出版多为套书、丛书,如百花文艺出版社的《百花散文书系》就分为当代、现代、古代等三个子系列,总计近百种。

(四)出版社优化结构,促进“整合”

20 世纪 90 年代初,出版社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,从 1991 年的 504 家增加到 1997 年的 566 家,仅增加了 62 家。其原因是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快速增加,出现了印刷能力、纸张供应和发行渠道不足的现象,出版社发展过快,超过了社会的物质承担能力。但这一时期却是图书出版业经营规模发展最快的时期,出书总定价从 243.66 亿元增长到 561083 亿元,图书销售也从 186.36 亿元增长到 461.64 亿元。但与国外相比,我国出版社的总量还算少,美国有出版社 8700 多家,日本在 2000 年有出版社 4406 家,中国台湾地区 2000 年有出版社 8887 家,其中正常经营的有 2000 多家。到 90 年代后期,为了优化结构,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了一些大型图书出版集团,同时也整合了一些高校出版社,在保持出版社性质不变的前提下,对出版社内部进行改革,旨在提高质量、创造品牌、改善经营、降低成本,最终实现企业化经营。

(五)印刷新技术推动出版业发展,电子产品开始兴起

80 年代末期激光照排技术的引进,使我国许多出版社的文字出版告别了“铅与火的时代”,呈现出革命性的变革。至 90 年代末,我国的出版业已全部实现激光照排,这种排版技术上的进步,不但大大加快了图书的出版速度,缩短了出版周期,而且提升了出版物的质量。值得指出的是,90 年代后期我国出版界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发 CD-ROM、CD-I、CD-G、Photo-CD 等电子出版物,并已连续两届在“莫比斯”大赛中获奖。到 1999 年,我国 DVD 出版达 223 个品种,发行数 10 万张。以北京、上海、广东三地为中心建成的一批规模较大、相对集中的光盘生产企业共有生产线 154 条,年生产光盘能力达 3 亿片。

三、新世纪: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多样化与全面繁荣

进入 21 世纪,我国图书阅读市场形成了个性化、多元化、网络化的“大文化”格局。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开始进入出版发行体制大力推进、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。

(一)出版社发展不均衡,竞争依旧激烈

2007 年全国出版社发展到了 579 家。以 2005 年为例,全国有出版社 573 家,其中中央级 220 家。经过整合后的出版业在出版集团的旗帜下向着更加规范化、科学化、规模化方向发展。但各出版社之间的差距很大,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出书最多可达 6600 多种,而藏文古籍出版社(小型社)年出书仅有 1 册,这凸显了我国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。在地方出版社中,年出书超过 1000 种的多数是教育出版社。除教育出版社以外,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绩效的是金盾出版社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、经济科学出版社、长江文艺出版社等。

(二)图书立法逐步完善,图书出口贸易增多

30 年来,我国新闻出版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和健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、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、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、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》等的出现,标志着我国出版业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。与此同时,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,实物出口总量逐年增加,图书出口达 730 多万册,是进口图书的两倍。

(三)网络文学兴起,数字出版产业蓬勃发展

进入 21 世纪以来,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,网络文学得到迅速发展。网络文学

的出版内容庞杂,玄幻小说、盗墓小说、轻松历史读物和穿越小说交相辉映。目前网上阅读的人群已超过2.5亿,因此对数字出版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,促进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。2006年,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已经达到了200亿元;2007年,中国电子书总量达50万种,规模稳居全球第一。起步于1993年的我国电子出版业,1994年只出版12种电子出版物;而2006年,我国的电子出版物已达7207种,发行量达1.6亿张。

(四)国家推行“走出去”战略,成效初显

中国出版业正在实现由“引进来”向“走出去”的转变,以产品带动文化走出去,以市场竞争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。“走出去”的渠道日渐多元化,国际书展、国际合作、国际交流、境外办社势头良好,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展会平台,已经成为“走出去”的助推器。对外图书推广计划推出的1400多种中国精品图书,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。一批以中国文化为内容的出版物走出国门,比如《中国读本》、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等,进入了国际图书市场,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。

(五)历史读物走俏,文学类图书凸显明星作家的偶像效应

2006年历史题材读物春回大地,易中天《品三国》发行当日,仅北京图书大厦就售出3500本,上市9天首印55万册已基本订完,又加印10万册,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上市的新记录。无独有偶,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中华书局首印60万册,目前发货已达80万册。徐兴业的《金瓯缺》、刘斯奋的《百门柳》、二月河的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一直畅销不衰。尤其是《雍正皇帝》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,更引发了长篇小说的“帝王热”。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《成吉思汗》,也是一部具有史诗风格的帝王小说。此外,《品人录》立足史实,从文化角度品评项羽、曹操、武则天、海瑞、雍正;《兄弟》的卖点在于引发读者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方式的深度思考,文学类图书正向历史化、深度化发展。

(六)少儿文学迅猛升温,青春文学的出版拉开序幕

近几年,我国儿童文学陆续推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、紧贴少年儿童学习生活实际、张扬童心童趣的优秀作品。秦文君的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女生贾梅》,杨红樱的《五三班的坏小子》、《淘气包马小跳》,陈磊的《鬼马少年》和《鬼子小丫》系列等,无一不是当代少年儿童真实生活的再现和心灵的真切呼唤。青春文学的崛起是21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,韩寒的《三重门》拉开了青春文学的序幕。随后,春树的《北京娃娃》、许佳的《我爱阳光》、郭敬明的《爱与痛的边缘》等,宣告了青春文学的兴起。而郭敬明的《幻城》和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,韩国少女可爱淘的《那小子真帅》以及饶雪漫的《左耳》等作品,标志着青春文学的全面鼎盛。郭敬明新作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、蔡骏的《天机》、“向《红楼梦》致敬”的长篇小说《蜜月》,以及书写“校园姐妹花”故事的《紫茗红绶》等青春小说,连续保持很高的畅销率,这表明青春文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。青春文学的崛起,毫无疑问是消费文化的产物,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都不自觉地向资本靠拢。文学与商业使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。

(七)养生类与饮食类图书“平分天下”

纵观生活类畅销书,养生类与饮食类图书可谓“平分天下”,共同构成生活类图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。21世纪“健康”是吸引受众眼球的焦点,兼顾时尚与实用的饮食类工具书成为生活类图书的最大赢家。如《40岁登上健康快车》语言通俗易懂,朴实且不失趣味,是它稳坐“畅销宝座”的重要原因。《人体使用手册》一书结合最现代的电脑软硬体架构,把人体当作一个完满智慧的机体,并与悠久的中医养生保健理论联系起来,其理论及方法掀起了一场养生方式大革命。

(八)文教类图书潜力与危机并存

一直以来,文教类图书始终占据着整个图书市场的重大份额。从文教类图书大类来看,主要包括教材、教辅和工具书三大类。近年来,教辅类图书竞争急剧“升温”,已经成为整个图书市场的“新宠”。它惊人的销售数字让人难以想象,而它充满潜力的发展空间又吸引人们去投奔这个市场。当然,一个市场“繁华”的背后,必然会隐藏着许多危机。现在各类教辅充斥市场,教辅种类泛滥,鱼龙混杂,真假难辨,已经给出版社的选择带来很多不便。教辅市场是一片广阔的图书天地,所以国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

加以规范,让教辅图书在一个正确轨道上健康发展。成功的例子,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新华字典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,都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。《新概念英语》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,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为经典、权威、正规、系统的英语教材之一,它以其地道纯正的英语吸引读者,引领英语类教辅书的风骚。

3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昭示,伴随着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我国图书出版事业也不断走过一个个跨越式的发展阶段。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,对图书多样化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,从而带来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变迁。当前,我国出版业发展之快、产品数量之多、总量规模之大为世界罕见,但质量、效益、竞争力、影响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,出版、发行业占国内GDP的比重还很有限。在国际间出版发行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,我国出版、发行总体上市场竞争力不够强,因此,无论从国内市场的现实状况还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,都迫切需要继续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宋木文:《亲历出版30年——新时期出版记事与思考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。
- [2] 阎晓宏:《新中国图书出版50年概述》,北京:中国出版年鉴2000年版。
- [3] 辛雨、黄瑶莉:《新中国文学出版50年》,载《中国图书商报》2001年3月29日。
- [4] 王洪波:《30年思想阅读折射中国社会变迁》,载《中华读书报》2008年4月16日。
- [5] 石宗源:《把握方向,继往开来,推进新世纪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》,载《新闻战线》2001年第1期。
- [6] 崔保国:《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。

(责任编辑 叶娟丽)

Development of China's Publication Industry since Reform & Open

Ma Jing, Huang Manli

(Foreign Acquisitions & Cataloging Department,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, Beijing 100081, China)

Abstract: 30 years' Reform and Open witnessed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China's publication industry: from a serious shortage to an ample supply of books. 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cial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various periods of time, this essay aims to draw a general conclusion through reviewing from the vertical angle, summarizing,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publication, dissemination, as well as transformation of book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.

Key words: since Reform and Open; publication industry; dissemination